

汉语方言学在语言学上的意义

刘镇发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汉语方言学在过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是因为汉语方言的研究,跟对语音学、音系学、语法、语义、历史语言学、文字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化等范畴都重视不够有很大的关系。由于过去缺乏全面的调查,以及对方言学认识不足,汉语研究的其他环节便也无法受惠。我们要抓紧机会,多收集材料并进行分析,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当许多弱势方言消失以后,很多宝贵的资料也会因此无法寻回。

关键词:汉语方言学;语音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 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0X(2003)04-0104-06

方言学过去在中国不受重视的原因很简单,可以归结为4方面:(1)重古代、轻现代;(2)重文字、轻语言;(3)重文言、轻白话;(4)重官话、轻方言。因此,方言研究便只好排到最后面去了。当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方言学,在100年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可以将本国的方言区以同言线划分的时候,我们的方言调查工作还没开始。更可悲的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方言研究在汉语语言学上应有的重要性。形成这个观念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汉语的研究不够,将方言排除在汉语以外,将方言和标准语的联系割断了,完全忽略了方言在共时上的互相制约,以及历时上的同根同源关系。其实,研究方言不但有助于我们对标准语的认识,而且更能帮助我们对整个“汉语”的全面了解。

—

汉语方言的语音变化多端,是语音学的宝库,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汉语方言声母的总和比欧洲语言还丰富。汉语方言中最特别的是

嘶音的变化。另外,汉语的韵母也变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

1. 声母

声母方面,汉语方言中的声母有简单的、数量只有15个的闽南话,也有相当复杂的、超过33个的浙南吴语和山东半岛的方言。

汉语方言中,声母数量一般是北多南少,东南部特别少。特别多而复杂的主要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浙江南部的吴语,另外一个为山东半岛的方言。最少的是福建东南部的闽南语以及附近的其他闽语、沿海的客语、粤语。数量少而简单的声母系统,就好像是上古声母的直接继承,如厦门只有14个:p,ph,mb,t,th,l,k,kh,g,h,ts,tsh,s,0。但其中也有扩充和简化,里面的声类和每个声类的内容,已经跟上古的有一定的差别。浙江南部吴语声母多的原因是它们有浊音。山东的一些方言声母繁多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嘶音系统复杂,有多个地点的方言有4套嘶音,主要是精、知、庄章和见系细音的对立。此外,在西北、山西、陕西、山东的一些方言中,中古知章组声母接三等合口韵时,声母都作pf或f。

收稿日期:2003-06-06

作者简介:刘镇发(1957—),男,香港人,厦门大学副教授,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生物学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主要研究汉语方言学、汉语史、社会语言学。

另外一个嘶音系统音值与别地不同的地区在广西,很多方言有θ、l等发音。黄山方言也有tl、tlh、l整套的嘶音。除了嘶音以外,其他声母的音值比较特别的有海南的吸气▶b、▶d相信是来自邻近少数民族的影响。

2. 韵母

韵母数目的趋势刚好和声母的相反,一般是北方少南方多,尤以闽粤两省的方言最多。虽然闽南语的声母相对简单,但一些闽方言韵母在90个左右,如潮阳。而最少的是云南的宾阳,只有22个。前者韵母数量繁多的原因是,除了一般的口腔元音以外,还有一套鼻化元音,加上入声有p、t、k和z,而鼻化元音又可以和喉塞音组成音节,又因为闽南方言有丰富的文白异读系统,所以韵母很发达。到了闽北,由于没有鼻化韵和入声韵,韵母的数量便大减,如松溪只有33个。除了闽南语以外,韵母较多的是客、赣方言,如梅县话有75个,而一般的官话方言韵母则在40个以下。

现代汉语方言大部份韵母主要的音节结构是介音/主要元音/韵尾(G+N+C)的结构,而且一般说来,介音跟韵尾不会相同。但这个主要规律有一些例外,如广州话等粤语方言缺乏介音,福州话等闽北方言有“双韵尾”,如eing,下江官话有iai,广东西南有些方言有uau,都明显跟汉语主流不同。这可以帮

音、塞擦音,也不能是辅音丛如ps、sp、kt。通过汉语方言的比较,便可以相当清楚地描写出汉语在中古以后入声消失的类型和途径。

3. 声调

汉语方言中声调最少的只有3个。西北地区如敦煌方言的声调只有平、上、去,主要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其他和普通话相若。除了西北以外,其他地区的方言也有3个声调的,如江西的宁岗,但却是平声分阴阳,清上和部份次浊上独立为一个上声,其余声调都根据声母的清浊分别合并到阴平或阳平。

由于南方话的不少入声有完整的3个塞音韵尾,入声字在南方方言的调类分配最有趣,最多会分派到4个调类。这以广西粤语和平话最明显,通常由韵母的主要元音决定。但江西的一些客赣方言则根据声母的清浊决定,更有一些是根据中古韵摄而决定,如江西安义的方言。

北方方言入声的变化跟南方很不一样,但也有一定的规律。在入声韵尾消失以后,入声调有4种演变方式:(1)独立成为一个跟其他声调不同的调值;(2)全部合并到一个已经存在的声调,如西南官话的所有入声合并到阳平;(3)入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派到两个声调,如兰银官话;(4)入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分派到3个声调,如胶辽官话。请看表1^[1]。

除了单字调以外,不同的汉语方言有更丰富的

表1 北方方言入声比较

	胶辽官话	东北官话	北京官话	冀鲁官话	中原官话	兰银官话	西南官话	江淮官话
古清音	上声	阴阳上多去	阴阳上去	阴平	阴平	去声		
古次浊			去声				阳平	入声
古全浊				阳平				

助我们对汉语音系学的认识。入声丢失:在客、粤、赣一般是p先并入t,例如韶关的粤语和客语,以及江西南昌话。但也有p并入k的,如兴宁话。在广东沿海的一些粤语和闽语,则是t并入k,如香港新界本地话(又称围头话)、潮州话。但是也有一些方言是先有部分字舒声化,如广东东莞,或部分字变为喉塞,如闽南语。到了吴语,长江下游的官话和山西一带的晋语,入声也就只有一个喉塞韵尾了。汉语入声韵的特点虽然好像很多变化,但总的来说,只有不送气的塞音这一特点,不能有擦音或其他类型的塞

连读变调方式。连读变调应该是一个中古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有前变、后变、两字、三字或更多字的变化方式。目前我们对这些现象还缺乏全面、深入的比较分析,难以作全面的评估。由于汉语是一个声调语言,汉语方言在声调上的多样性,让音系学家能更有效地研究声调的起源、发展和演变的方向。

虽然我们今天对汉语方言已经有初步的认识,收集了不少汉语方言的材料,但是汉语音系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各种方言的音位是历史语音演变的结果,作比较方言研究,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了

解历史音位的分立与合并,另一方面也可以确立方言语音的对应关系。

从不同方言的音系结构的比较,可以解释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一些语音现象。例如家麻/车遮的分合。如果我们跟历史上的韵书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韵在宋代以前还没有分化,宋代以后有些韵书分,有些韵书合。目前的共时分布是,官话方言和粤语是分的,但客赣、老湘语和闽语大都是合的。新湘语、吴语是文读分,白读合。本文第一作者曾经指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现代粤语,是宋代移民将当时的官话直接带到广东而形成的^[2]。因此,将广州话归到宋代官话便很容易理解。我们只须假设,车遮[e]读的发音在宋代开始在中原形成,跟着从中原向南方慢慢扩散,明代中叶到达长江流域,但到今天始终还不能进入江西、粤东、福建,而在湖南、浙江、官话车遮[e]读的影响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了只要我们掌握方言资料,很多共时和历时的音系学、音韵学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二

1. 儿化现象、名词词缀

除了上述的人称代词外,汉语各地的名词词缀

演化为元音的高化。如果没有这个记录,我们对今天的语音就无法了解了^[3]。

梅县和香港郊区客语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用“公、婆、嬷、哥”等带性别的词,作为相当于“儿、子”的词缀,由此形成的词汇是没有性别的^[4]。例如鼻公(鼻子)、鹞(婆鹰)、姜嬷(生姜)、蛇哥(蛇)等。

上面的例子说明,除了北方方言的儿化以外,汉语方言中其他类似儿化的形式很多,而且很多地方都有一定的特色,不能一概而论。这些形式至今还没有学者将之作一个全面的比较,更谈不上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2. 语法现象

赵元任曾经认为,汉语只需要一部语法书就够了,但今天很多人却发现事情并非他说的那么简单。各种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的语法词是相当多姿多彩的,就算是类似相关的南方话,词缀也有不同的词形。请看表 2。

广东表示完成的动词助词,在珠江三角洲有“tso”、“heu”两大类,粤东客语地区则有“tet”、“pet”、“e”等。湖南的“ta”分布最广,再加上“ka/ko/ku”一类,另外也有“po”的形式。同时,梅县和恩平虽然属于不同的方言区,地理上相差很远,而且没有明显的移民继承关系,何以都用 e 作为完成式助词也是令

表 2 湖南和广东部分方言点的完成体标志词缀

广东		湖南	
广州, 香港粤语	tso	隆回	ku
东莞粤语	heu	邵阳, 长沙	ka, ka - ta
香港客语	hoi	常宁, 常德, 益阳	ta
兴宁	t ^h et, li	攸县, 涟源	li, ka - li
梅县	p ^h et, e	安乡	p ^h o, ta
恩平	e		

也是五花八门,除了普通话的儿化、轻声、子尾以外,各种方言都各有特色。一般来说,儿化现象在北方极为流行,但在南方则有其他的表现形式。

在浙江等地区的吴语方言中,对象、动物的小称加儿尾有很多种方式。曹志耘比较过南部吴语的小称,总结出有儿缀型、鼻尾型、鼻化型、变调型和混合型。1976年出版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便记录了很多以 n 或 ŋ 收尾的“白话音”词汇。这些词到了今天, n/ŋ 尾已经消失,有些是在后面加鼻音,最后

人费解的。由于我们对汉语方言的调查还不够彻底,因而很难作出一些有意义的跨方言比较。

3. 语义

方言的差异除了语音以外,另外一个出现差异的范围是词语。方言词汇差异的来源主要有 3 种:(1)古词语的保留。例如官话说“找”,客赣和闽南说“寻”,是宋代的词语。北方话中的“锅”在广东客粤语里是“镬”,也是宋代的词,闽语、湘语是“鼎”。鼎、锅是晋以前的说法。北方话中的“稀饭”在粤语、客语里

是“粥”(宋代词),在闽语是“糜”(晋代)。闽语保留的词最古老,粤客赣一般只有宋代的词,北方话更新。研究方言词汇的差异对研究汉语词汇史的研究会有很大的帮助;(2)由于不同方言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不同的方言对近代才进入中国的事物便产生不同的说法。例如,花生、玉米、马铃薯、红薯等作物,在不同的方言中就有不同的名称。有时候我们如果知道一种作物或动物在各个方言的名称,便可以知道某种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路线。例如“番薯”的说法在福建省内没有例外,原来,它就是闽人在明朝时从菲律宾引进的;(3)直接借入其他民族的词语。这有历史的借入和近代的借入。历史的借入和古词语的保留有时很难鉴定。例如,广州话、潮州话中表示看的“睇”,有人认为是从前的少数民族留下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古代南方方言词。在近代的借词中,香港的粤语大量借用英语,闽南语借用马来语,台湾的闽南语借了一些日语,东北的方言借用满语和俄语,云南、贵州、西北等地的汉语则借用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词语等。

三

汉语方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汉语史,比较语音和音系,重构中古和上古汉语,纠正我们对汉语史的误解。

1. 庄组/知组/照组形成的关系

在闽语、平话、南部吴语、“老湘语”等方言中,知组在口语中保持了塞音。在其他一些方言中,精庄章一般都合并为一组嘶音(一般是舌尖音),或者是以后面的前高元音为条件顎化而多出一组舌面或舌叶嘶音。但是在部分地点中,却显示出精庄跟章组对立,跟客赣方言相当一致的情况。由于精二演变为庄组是切韵以前便发生的音变。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方言比较,确定这些方言的关系较为密切,而且明显地跟中原方言不同。

汉语方言在形成了多组嘶音以后,最近又进行过合并。最明显的是官话方言中,东北和西南的很多方言点的卷舌音,已经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与舌尖音合并。广东的粤语、客语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不及时作全国调查,在不久的将来,当这些嘶音都合并为一套以后,汉语嘶音演化的过程便无法用

方言资料重构。这是非常可惜的。

2. 娘、泥、日的关系

除了嘶音以外,汉语方言的另外一个发展得最快的声母是n。上古的泥母到了中古发展出娘、日,学者们到目前还争论着它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有没有“娘”母,我们也可以从比较方言中得到答案。目前梅县、香港郊区客语的泥母拼细音都顎化为舌面鼻音,跟日母开口和疑母三等合流(泥、娘日开疑),但普通话中却是泥娘、日、疑,没有“娘”母。香港粤语今天是泥娘、疑洪、日疑细(但后二者在新派已经合并),如果我们要弄清楚这个争论,就必须小心比较中国各地的方言资料,梳理出整个声母在历史中演化的过程。

3. 韵书之间的关系

学界过去忽略了方言研究,忽略了“标准语”的相对性,错误地认为标准语是一成不变、一脉相承的;忽略了在过去几千年间,由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原有的“标准语”被贬为“方言”(如南京话),或分裂为多个方言(如西南官话),而一些方言又在适当的时候跃升为“标准语”(如北京话)。研究共同语和方言的变迁可帮助我们了解整个汉语发展的过程。

过去不少学者在研究历代韵书的时候形成一种观念,以为历代的韵书都是作为通语的官话音系一个接一个线性地传承下来,不可能有韵书代表“方言”的现象。最近张玉来^[5]指出:其实历代的韵书很多都是作者心目中当时的“标准音”,语音的基础应该是当时的官方语言。但受到作者的认识水平和方言背景的影响,所以各本韵书的音系出入十分大。通过方言资料,我们可以看见河北省的声韵和入派三声情况跟《中原音韵》并无二致;而《西儒耳目资》则是以旧南京音为基本内容的明清官话^[6]。目前只有掌握全国方言的资料,我们才可以对各个时期,不同籍贯作者所编纂的韵书做出科学的分析。同时我们要对移民史、语音史有正确认识,这样便可以了解过去的官话和方言的互动关系。

四

汉字是一个形音义的结合体。目前的汉字是历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比较方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字。有些文字是某个时期的通语,给固定了下来,

但后来在共同语甚至大多数方言中丢失了,仅有少数词还会残留在一些鲜为人知的方言中。这些词在方言口语中常被认为是“有音无字”。如果我们有了基本的方言学概念,就会发现很多汉字或词汇的创造,都是在方言区发生的,有些会辗转传到共同语,再传播到其他方言去。共同语和方言是相对的,人民的迁徙,政治中心的转移,都会导致共同语和方言的互动。如果对方言的本字有更多的认识,便可以对中国文字有更多的认识,甚至可以破解更多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

研究汉语方言还有社会语言学的意义。由于移民、通婚和商业往来等因素,原来操同一个方言的人,会接触到另外一个方言。两个方言相互接触以后,会由于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较量,产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方言接触所发生的变化通常会有以下几种结果:(1)一个方言占据了多方面的沟通功能,成为“强势”方言,另外一个慢慢在一些范畴中消失沟通的功能而成为“弱势”方言;(2)一种较强势的方言作为教育语言或传媒语言,只在课堂上和传媒上使用,没有实际进入日常生活。例如,普通话在广州,广州话在梅州、潮州;(3)两个方言团体人口相当,但缺乏沟通,甚至互相敌视,这样两个方言的接触的机会便会大为减少,两个方言的保存则相对完整。例如,香港早期的本地话和客家话,桂南的平话、白话和西南官话大体上是相安的。

汉语方言的数量庞大,人民的流动频繁,形成新城市,新社区,近代文教、交通、商业和传媒的发达等等,都使得汉语普通话和强势方言正以高速度扩充它们的沟通范围。方言间互动的模式发生了千变万化。我们应该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研究各种方言使用情况的变动。本文第二作者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对福建西部的闽南语和客语的使用作了详细调查^[7]。这都是社会语言学的珍贵资料,值得其他地区研究推普和语言生态时借鉴,力求做到推普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存汉语方言的资源。

研究和观察方言互动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方言在音系上的变化。目前不少方言区在推普以后,有新派和老派之分。新派方言向普通话靠拢。香港的客家话使用者虽在过去几十年接受粤语教育,但新派的音系也受到重大的影响而演变。粤北

土话本来是粤北地区流行的方言,但土话之间互相不能通话。后来由于客家话在17世纪以后进入粤北,成为当地的沟通用语。20世纪以后,由于战乱的缘故,广州人大量移民韶关,粤语取代了客语在城市作为沟通语的地位;又因为学校推行普通话,粤北土话使用者的人数比客家话使用者少,出现了土话使用者无法维持母语的局面,为了有效沟通,客家话退居家庭、村落,土话则处于萎缩状态。目前在韶关城市范围的土话,只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家才会说。我们在记录这些土话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弱势”方言消失的过程。

方言间的互相渗透和影响有时会使方言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例如,比较贫困的县市学习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会城市的方言,最后导致周边方言的萎缩,甚至衰亡、消失。由于方言群体间的斗争、抢夺资源,两个本来相近的方言也会变得互不认同而走向分化,变成两个方言。汉语方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分有合,有兴有衰,反映为不同语音的层次,不同词汇的交替。这需要进行深入地调查才能充分了解。

汉语方言的研究是我们把握汉语的历史,包括汉字的使用和汉语语音的发展的最可靠、也几乎是唯一的途经。虽然前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地点留下不少的韵书,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历史语音的资料,但比起目前的方言数量,这些韵书可以说只是沧海一粟,只能充当辅助材料。可现在却还没有人记录过各种语音变化,包括连读、小称、儿化等现象。

方言不仅可以证音韵,也可以证文字和训诂。通过方言,我们可以了解汉字在不同地域的形音义变化。汉语在语音发展上有跟其他语言共同的规律,也有自己的个性,这也是依靠方言资料来论证的。

然而,目前我们的方言研究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隐忧。随着社会的发达,推普进展顺利,不少方言语音正在迅速消失,我们正在和时间竞赛,争取在一些珍贵的资料永远失去以前,捕捉到它们的踪影。在充分了解到方言的重要性以后,我们更要利用现代工具录制各种各样用方言说的、唱的语料,让它永远保存下来。在语言政策上,也应该作适当的调整,让各种方言与普通话长期并存,把汉语比其他西方语言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保存下来,使我们的后代也可以从这座方言博物馆的丰富资源中得到享受。

参考文献 :

[1]刘勋宁. 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J]. 中国语文, 1995, (249): 447 - 454.
 [2]刘镇发. 现代粤语始于宋代移民说[A]. 方言增刊: 粤语研究 (第七届粤方言学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76 - 83.
 [3]徐通锵. 历史语言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4]Lau Chun - Fat "Gender" in the Hakka Dialect: Suffixes with

Gender in more than 40 Nouns[J].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999, 27(2): 124 - 131.
 [5]张玉来. 论近代汉语韵书音系的复杂性[J]. 山东师大学报, 1998, (1) 90 - 94.
 [6]张卫东. 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J]. 深圳大学学报, 1998, (15) 73 - 78.
 [7]李如龙等. 福建双方言研究[M]. 福州: 汉学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 陈红】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to linguistics

LIU Zhen-fa, Li Ru-long

(Dept of Chinese, Xiamen Univ., Xiamen 361005, P. R. China)

Abstract: Insufficient attention was given to Chinese dialectology in the past. Therefore, some other studies related to this field also remain underdeveloped. The reason is that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s affects the fields of phonetics, phonology, grammar, seman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hilology, socio -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hange. Due to the lack of general survey and hence of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dialects, the other fields were not benefited. Now, we must get hold of the chances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useful materials we can get. Otherwise, when some less - used dialects vanished, we would lose many precious data for our studies.

Key words: Chinese dialectology, phonetics,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o - linguistics



【学术信息】

税务协谈法律问题初探 / 陈珠成

作者在台刊《财税研究》第 35 卷第 3 期上发表文章指出, 现行税务案件的协谈, 从选案、审核决定、选定协谈人员, 及至案情的了解等程序观之, 该作业规范尚称严谨, 也达到内部控管的标准, 纳税义务人的税务协谈程序权益亦全面有所顾及, 惟税务协谈案件从产生、协谈到结果, 其发动权均为税捐稽征机关, 纳税义务人纵然有协谈的意愿, 并没有提出协谈的权利, 另外, 在选案的设计上, 就课税事实或证据是否在客观上确有不明确之处, 也欠缺

衡量准绳, 协谈与否便取决于承办人员的自由心证。稽征机关的税务案件承办人员, 是否会因懒得查证或因长官要求尽速结案, 或为稽征绩效, 即要求纳税义务人进行协谈, 要求纳税义务人妥协, 要求纳税义务人让步, 已非无疑。因此, 在税务协谈予以法制化的同时, 此部分的规范亦应更加严谨, 以防杜不当的协谈, 方属“协谈作业要点”所追求疏减谈源的真谛。

(叶普照摘编)